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重点课题
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立项资助出版

湖南

刘茂松 等著

崛起论

——关于“强势开放 新式工业 城市带动”的
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战略对策分析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

刘茂松
等著

崛起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崛起论/刘茂松等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2

ISBN 978-7-5438-5118-4

I. 湖... II. 刘...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发展—
研究—湖南省 IV. F12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5564 号

责任编辑:李雄伟
黎晓慧
装帧设计:黄敏

湖 南 崛 起 论

刘茂松 等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营销部电话:0731-2226732)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富洲印刷厂印刷

200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30×960 1/16 印张:20

字数:315 000

ISBN 978-7-5438-5118-4

定价:40.00 元

本书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跟随全国前进的步伐，以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为动力，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先后采取“以开放促开发”、“五区一廊”、“农业强省”、“呼应两东”和“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等发展战略，全省经济社会进步明显，与计划经济时代比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同我国东部地区和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却依然比较落后，即或是同中部地区比较，我省也不在先，处于3~4位。总的来看，工业化程度比较低，只是刚刚进入工业化的中期，传统农业所占的比重仍很大，产业结构低度化的特征明显，经济效益水平不高。

目前，在党中央“促进中部崛起”这一战略的号召和激励下，中部地区各省都在争先恐后出招，力借中央的政策东风，在中部率先崛起。在这种情势下，湖南如何办？如何呼应中部崛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针对这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我们在原有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深入调查和研究，抓住直接影响湖南经济崛起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探索 and 战略创新。

我们认为，湖南呼应中部崛起，必须根据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形势、新机遇、新要求，在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全力打造竞争优势，实施以“强势开放，新式工业，城市带动”为基本内容的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战略，近10~15年要依托自身高新技术的现有优势，通过反梯度的“选资”和参与新的国际分工，打造工程机械制造业“超级产业”，并围绕超级产业推进现代产业集群，培植大企业集团和规划发展长沙核心城市以及长株潭“3+5”现代城市群带，全面发展包括农业工业化在内的新型工业化，进而带动整个湖南经济又好又快崛起。

前 言

湖南位于长江中游，属大陆型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水热光照充足，自然资源丰富，生态资源独具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业资源丰富。2003年末，湖南省拥有耕地面积383.37万公顷，在中部六省列第4位，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9%，占中部六省的15.9%；水稻和苧麻产量居全国首位，生猪产量居全国第2位。二是多种有色金属和非金属储量资源丰富，在世界已知160多种矿产中，已发现141种；重要矿产中，钨、普通萤石、海泡石、石黏土、隐晶质石墨等居全国第1位，钴、钒、锑和重晶石等居全国第2位，其中钨、钼、锑的保有储量在全国和全球均具优势，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34.81%、37.18%和9.34%。三是旅游资源丰富。湖南既是始祖炎帝的发源地，又是伟人名流故里；既有鬼斧神工的张家界，又有神秘的凤凰古城。

从产业规模区位商（某地区某行业增加值占本地区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全国相应行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看，湖南在烟草制品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行业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优势。

从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看，湖南以铁路为骨架，公路为经络，民航、水运为补充的多功能的交通运输网基本形成，为湖南连接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创造了条件。到2005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400多公里，列全国第9位，居中部第3位；铁路里程居中部第3位，株洲北站是江南最

湖南崛起论

大的列车编组站；水运居中部第1位，通过岳阳城陵矶5000吨级码头可以通江达海；通过黄花、荷花国际机场可直抵香港。以光纤电缆、短波和微波等构成的四通八达的电信网遍布全省，在全国和中部居前列。以上这些，均为湖南经济的崛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跟随全国前进的步伐，以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为动力，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先后采取“以开放促开发”、“五区一廊”、“农业强省”、“呼应两东”和“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等发展战略，全省经济社会进步明显，与计划经济时代比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只是同自身的过去比较而言的，如果进行横向比较，同我国东部地区和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却依然比较落后，即或是同中部地区比较，我省也不在先，处于3~4位。总的来看，工业化程度比较低，只是刚刚进入工业化的中期，传统农业所占的比重仍很大，产业结构低度化的特征明显，经济效益水平不高。

再从整个中部地区来看，伴随着全国改革与发展的步伐，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按国家统计局的可比价格计算，1981年至1990年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8.75%，1991年至2005年期间又进一步上升到10%以上。但是，由于中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相当高，是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因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立足于传统农业、轻工业、服务业和低层次劳务经济基础上的增长，现代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还很低。传统产业支撑的经济增长，资源消耗多，成本水平高，经济附加值低，且增长速度也很慢。所以，用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落后的增长”，是传统落后产业的增长，它远远大于现代先进产业的增长。这样，就会形成相对贫困的累积性效应。这一方面反映在GDP增长率上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1981年至1990年东部地区平均增长率为9.98%，中部与之相比低了1.23个百分点；1991年至2001年东部地区又再度快速上升到12.94%，而中部仅只达到10.70%，比东部低了2.24个百分点。与1981年至1990年期间相比，其绝对量差距拉大了1.01个百分点，相对量差距扩大了82.11%。另一方面是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1980年中部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东部地区的65%和78%，到2002年这两个比重下降到49%和62%，均下降了16个百分点。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说“中部在塌陷”。

面对中部地区的这种“落后的增长”的局面，党中央继沿海大开放、

西部大开发、东北大振兴之后，提出促进中部崛起，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举措。中部地区大多是传统农业产区，有农业资源的优势，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具备条件，这在中部崛起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也应该看到，中部地区还有原材料工业、冶金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交通机械制造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等。所以，中部崛起，应该是包括农业工业化在内的中部工业化的崛起。

目前，在“促进中部崛起”这一战略的号召和激励下，中部六省各显其能，力争借中央的政策东风，在中部率先崛起。在这种情势下，湖南如何办？如何呼应中部崛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针对这个重大现实问题，本项目作为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立项的重点课题，在原有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抓住关键，突出重点，经过历时一年多时间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探索和战略创新。我们总的认为，湖南呼应中部崛起，必须根据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要求，在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全力打造竞争优势，以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带动整个湖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本项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建树：

首先是在理论层面，重新阐释了后发优势理论。新经济时代后发优势的发挥，不仅仅是指一个国家简单吸收先进国家技术的优势，或者是具有资源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在自然资源、资本、劳动以及制度各生产要素的利用和配置方面发挥本国的有利形势，立足于技术、制度创新而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产业和产品的差异性竞争优势。我国应该把发展思路从强调立足于比较优势的后发优势的发挥转移到以竞争优势为核心和基点的后发优势的发挥，从传统工业经济向信息工业经济转变，充分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外部效应，建立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赶超”能力，发挥自主创新型后发优势使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内生化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以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赶超。由此，我们认为，中部崛起的现实针对性是中部地区目前正处于“落后的增长”，崛起的要害就是要依靠基于竞争优势的后发优势发挥，以现代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来打破这种“落后的增长”。所以，中部崛起的内涵不是指一般性的发展，而是中部突进和中部赶超。

其次是在战略层面，根据发展新型工业化的要求，以基于竞争优势的后发优势理论为依据，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理论，提出湖

南和整个中部地区的赶超发展必须推行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战略。所谓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是指某种产业经济的流程改变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扩展流动的常规方向,而反过来由低梯度区向高梯度区推移。这是因为地区间存在经济技术水平的梯度,不一定就是先进技术引进和经济开发的顺序。如果低梯度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比较好的外部经济效应,且又有市场的需要,并具备必要的基础条件,就可通过引进和创造先进技术,对某些有优势的产业进行大规模开发,实施赶超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可向高一梯度地区进行反向推移。在这里,反梯度推移的实质是产业革命和产业创新,即非连续性的产业转换。本课题成果通过对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现状的比较分析,针对目前湖南实施赶超发展的优势和矛盾,对湖南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战略创造性地构思了“强势开放,新式工业,城市带动”的行动方案。其具体的技术路线是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发达国家产业技术转移中的外溢性,对其原创技术、产品的设计思路与原理进行反求破译,实施自主创新,开发出同行业中具有功能差异性的高端产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其一是加速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湖南的新材料技术产业、生物医药技术产业、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等都已有很好的基础,只要进一步打造,完全可以赶超发达地区。其二是用高技术去改造湖南传统的工程机械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石化工业、建材工业等,形成光机电一体化先进制造业。其三是用工业化去改造传统农业,搞农业工业化,全力发展专业化、田园化、标准化、机械化、定单化、高效化的现代农业和现代食品工业,实现由传统农民向农业工人的转变。

再次是在操作层面,根据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的战略要求,抓住目前的几个要害问题,分专题系统设计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湖南开放经济、科技创新、产业集群、企业重组、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的对策措施,创造性地提出了在近10~15年,湖南要依托自身高新技术的现有优势,通过反梯度的“选资”和参与新的国际分工,打造工程机械制造业“超级产业”,并围绕这个超级产业规划发展长沙中心城市和长株潭“3+5”城市群,培植大企业集团和推进农业工业化等战略和对策。即以“长株潭”为空间载体,引进先进技术和产业资本,并改革目前的行政与财政体制,以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山河智能、长丰集团、湘潭电机、江麓机械、株洲时代和远大空调、LG曙光、湘计算机、创智软件等骨干企业为核心,形成机械电子制造工业的“五大产业集群”,以隆平高科、正虹科技、洞庭水殖、

金健米业、亚华种业、湘大集团、华升工贸和泰格林纸等骨干企业为核心，形成湖南农业工业化的米制品、肉制品、果制品等产业集群，以此“做大做强长沙，整合株洲湘潭”，打造区域性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巨型城市，并进一步与衡阳、娄底、岳阳、益阳、常德等五座城市一体化，形成南与广州、北与武汉、西与重庆、东与上海相对应的、能带动全省经济的新型工业化城市群带。同时，本课题成果根据新时期农业产业多功能的特性，紧密联系湖南作为全国农业主产区的现实，以国家财政政策为重点，从公平性财政、工业反哺农业、先富帮后富和多工具组合投融资等四方面进行创新，提出了湖南呼应中部崛起的财政政策体系。

总之，本项研究成果的主要特色是直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服务，根据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要求，紧密联系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南经济发展的实际，综合运用市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企业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理论和战略的创新和探索，提出了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的战略对策和政策建议。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发展中地区经济崛起的理论分析 /1

1.1 理论假设及文献综述 /1

1.2 后发优势的实质与竞争优势 /3

1.3 竞争优势形成的基本路径 /7

第二章 中部地区和湖南经济崛起的要害 /14

2.1 相对贫困循环理论及国际现实 /14

2.2 中部地区和湖南经济“落后的增长”现象 /16

2.3 造成湖南经济“落后的增长”的症结 /22

第三章 实现湖南崛起的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战略 /25

3.1 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发展战略的内涵 /25

3.2 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发展战略的实质 /27

3.3 实施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战略的路径 /29

3.4 促进湖南和我国中部崛起的财政政策 /34

第四章 湖南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经济全球化对策 /39

- 4.1 新国际分工条件下的对外开放理论 /39
- 4.2 全球化条件下的新型国际分工格局 /46
- 4.3 湖南开放经济的实证分析 /55
- 4.4 湖南参与国际分工的反梯度战略安排 /74
- 4.5 湖南反梯度开放的会展经济发展思路 /82

第五章 湖南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的科经一体化对策 /91

- 5.1 创新与高新技术产业化理论综述 /91
- 5.2 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发展趋势 /98
- 5.3 湖南高新技术产业经济状况与比较 /102
- 5.4 湖南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创新体系 /112
- 5.5 湖南高新技术创新与经济一体化思路 /116

第六章 湖南以超级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集群对策 /128

- 6.1 发展超级产业的理论分析 /128
- 6.2 国外超级产业发展经验与启示 /137
- 6.3 湖南产业结构状况及比较分析 /143
- 6.4 湖南超级产业的选择 /151
- 6.5 湖南发展超级产业的措施 /166

第七章 湖南以工业化为路径的现代农业发展对策 /176

- 7.1 农业工业化理论分析 /177
- 7.2 农业工业化的评价体系 /183
- 7.3 农业工业化的国际比较 /189
- 7.4 湖南农业工业化的实证分析 /198
- 7.5 湖南推进农业工业化的战略对策 /205

第八章 湖南打造大企业集团的企业重组与改革对策 /220

8.1 新经济时代的大企业理论 /221

8.2 国外大企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229

8.3 湖南大企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236

8.4 湖南崛起的大企业战略思路 /241

8.5 湖南大企业的治理结构模式 /247

附 录 /258

附录1：“区域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高度化” /258

附录2：湖南区域经济产业化现状与对策建议 /259

附录3：知识经济与湖南经济反梯度推移发展 /270

附录4：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及对策分析 /274

——关于中部地区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战略的探讨

附录5：论国际分工的反梯度推移演进均衡 /278

附录6：关于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的几点思考 /291

后 记 /299

第一章

发展中地区经济崛起的理论分析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在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少数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后来居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但没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这一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而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中甚至已经被“边缘化”。中国中部地区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地区,正处在经济跨越式发展阶段,如何利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外部效应,以及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日益紧密的联系所带来的后发优势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和高效的生长,是信息经济时代“发展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实现中部地区和湖南崛起的关键。

1.1 理论假设及文献综述

关于后发优势的研究,长期以来是理论界的热点之一。自从格申克龙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假设之后,国际上许多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尝试过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产生了许多有意义的理论成果。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提出了后起之益说。格申克龙对1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经验分析,认为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差异将影响发展的进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是落后,工业化起步越是缺乏连续性,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其增长速度就越快。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些国家具有一种得益于落后的“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他特别指出,后发优

势是由后发国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一特殊益处在先发国是不存在的,也不是后发国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的,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后起之益”理论认为,后起国家在工业化前提条件与工业化模式方式方面同先进国家之间客观上存在一些偏差,这种偏差可视为对先进国家工业化标准前提条件和理想工业化模式中相应内容的替代。即后起国家工业化在资源条件上的可选择性和时间上的节约,促成工业化的“大突进”,并快速取得成功。这种替代性具体表现在后起国家通过开放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并吸取其失败教训,以及对经济落后和寻求工业化发展的强烈的社会意识等三个方面。可见,后起国家工业化的替代以及替代成效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自觉选择能力。

在全球化即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原来封闭条件下不能流动的商品和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因此,后发优势的表现更加突出,影响更加深远。格罗斯曼和赫乐普曼(Crossman and Helpman)1991年首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了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把一国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动态过程内生化了。然而,他们仍然维持不同国家之间技术能力的差异是永久的外生变量的前提假定,因此他们的模型的结果是不同国家在技术模仿或技术创新两种角色之间将最终实现完全的分工化发展。巴罗和萨拉易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假定一国进行技术模仿的成本是该国过去已经模仿的技术种类占现有技术总数量比例的增函数,也就是说,一国过去模仿的技术越多,其继续实行技术模仿的相对成本就越高。同时,他们也假定技术模仿的成本要比技术创新低得多,而某些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将在技术创新方面拥有其内在固有的优势。由此,他们的模型所导出的结论是通过技术的赶超,一国的学习能力将最终体现在其拥有的内在固定优势方面,并且各国在长期内将实现收入的趋同。范艾肯(R. Van Elkan, 1996)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了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他强调的是南北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趋同,即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的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伯利兹、克鲁格曼等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发展的“蛙跳”(Leap-frogging)模型(Brezis, Paul Krugman, Tsiddon, 1993)。它是指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已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后进

国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它强调在技术发展变化的顺序上并不严格按照由简单到复杂的路径,可以跨越技术发展的某些阶段,直接开发、应用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与先进国家进行竞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和蓬勃发展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在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资本形态已发生重大变化,知识资本及其载体人力资本具有积累作用,并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就使资本具有异质化的特征,进而出现了资本收益递增的趋势。应该说,这是资本发展史上的一场重大变革,它意味着人类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范式转换已进入一个新的资本收益递增的历史时期。因此,在信息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变量,发达国家的产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密集的程度不断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在这种新形势下,发展中国家依靠自然禀赋的自然状态来获得成本比较优势已越来越困难,必须推动国家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以上分析说明,在新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变量,相应的,指导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思想和战略方式也要产生革命性的转变。传统工业经济下,我国生产的大多为资本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工业化前期通过大量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获取规模经济效应,能够很快处于成本比较优势地位。但在信息经济时代,依靠自然禀赋的自然状态来获得成本比较优势将会越来越困难。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使发达国家的产业、产品正在向高新、高效、高质,更加集约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密集的程度不断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正在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主要包括各国经济结构与政策、不同程度的体制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等等。以上两大趋势发展的结果,导致世界市场上在人才、技术、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竞争迫使参与国际市场的各国都必须提高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由此也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数量和速度的增长向质量和效益增长转变。

1.2 后发优势的实质与竞争优势

后发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虽然是与落后性共生、而非人为创造,但



要将这种自然存在的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利益,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后发优势的发挥不仅仅是指后进国家资源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资本、劳动以及制度各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和配置方面所具有的能力,即立足于技术、管理、制度创新基础上的产业和产品的差异性竞争力,这在同类的发展中国家中才具有竞争力。所以,后发优势的实质是创造和发挥竞争优势,而非以往人们一直认为的那种天然状态的比较优势。

1.2.1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比较分析

长期以来,指导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理论基石是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的比较成本学说。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各国应按照各自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从事生产,并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各自的比较利益。我国在经济追赶的初期建立起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规模经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随着世界经济趋势的变迁,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条件下有较大的局限性。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使世界经济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是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使发达国家的产业、产品正在向高新、高效、高质,更加集约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密集的程度不断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增强。二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正在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主要包括各国经济结构与政策、不同程度的体制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等等。以上两大趋势发展的结果,导致世界市场上在人才、技术、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竞争迫使参与国际市场的各国都必须提高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由此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由数量和速度的增长向质量和效益增长转变。在这种强大的竞争压力下,如何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许多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国际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在国际经济领域兴衰的根本原因是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而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能否使其主导产业拥有优势,而建立优势产业的基础则是提高生产效率、引入竞争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他把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看成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他的钻石理论(竞争力模型)包括要素条件、本国需求条件、相关支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程度等四个方面的因素。波特认为这四个

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加强，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由此产生具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明星产业。

总的来看，传统的比较优势是由土地、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基本生产要素决定的，是一种静态的天然的竞争力。而竞争优势不仅与土地、劳动力、物质资本、自然资源等天然状态要素有关，而且与机制、政府的质量、管理水平、人力资本、产品的品牌、技术创新等高级软要素相关。竞争优势的构成要素中的知识、技术、管理、制度等高级软要素是动态的、可变的，来自于一国的后天积累，是先天禀赋加后天要素和企业行为形成的竞争力，是一种动态的竞争力。落后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但并不意味着其产品在国际市场就具有竞争优势，还容易陷入静态比较利益陷阱。只有将比较优势动态化，进而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竞争优势是国际竞争中更具能动性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对立的替代关系，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易于转化成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也就是说，比较优势可以成为竞争优势的内在性基础因素，促进特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国际竞争中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只有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如果缺乏国际竞争力，其比较优势便不存在；反之，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由于缺乏比较成本优势的基础，往往难以形成和保持国际竞争优势。

1.2.2 后发优势与竞争优势的逻辑联系

“后发优势”是一个综合的、广义性概念，是指后进国家由于落后以及后发展地位而具备的在生产要素利用和配置方面的有利形势，即后进国家拥有资源优化、技术跨越、制度捷径的有利形势，充分利用这些有利形势可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最终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赶超。“后发优势”的本质和目的就是要实现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这只有建立在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

竞争优势理论把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看成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的总和。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上，而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则建立在通过对设备、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持续的投资和创新而创造更能符合客户需求的差异型产品上。为了创造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企业唯一的选择是进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因此，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持续不断的投资和创新。虽然要素禀赋的投入是企业投入和创新的基